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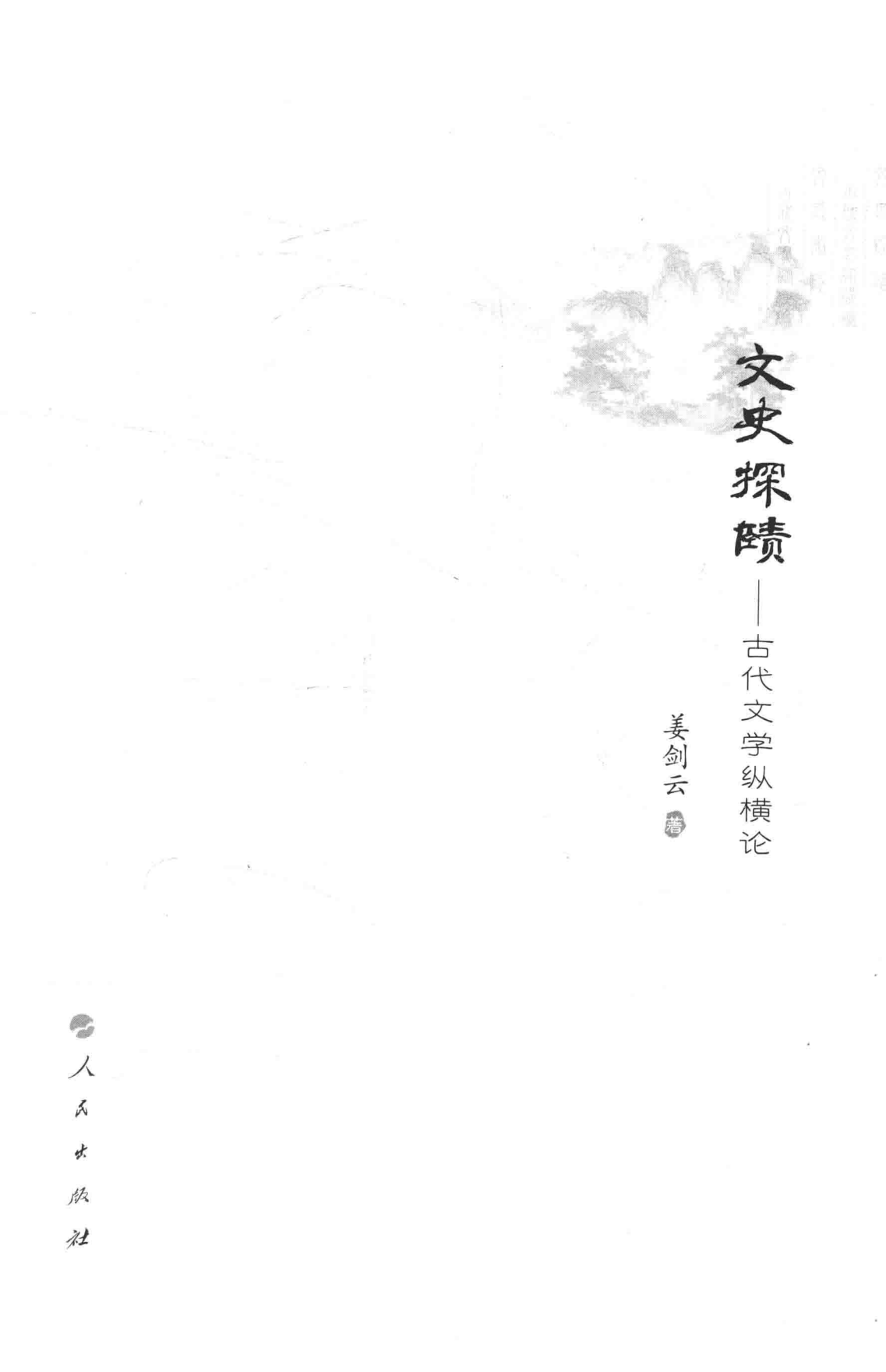
文史探赜

——古代文学纵横论

姜剑云 著



人民
教育
出版社



文史探蹟

——古代文学纵横论

姜剑云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怡石

封面设计:姚 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探赜——古代文学纵横论/姜剑云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1
ISBN 978-7-01-017897-4

I. ①文… II. ①姜…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2237 号

文史探赜

WENSHI TANZE

——古代文学纵横论

姜剑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75

字数:300 千字

ISBN 978-7-01-017897-4 定价:5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一

河北大学姜剑云教授即付新刊向东亚学界抛出一束光。我本是在韩国以古代文学为中心来探究文学思想的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每每品读姜剑云教授的大作均会受到鼓舞和启发，也借此机会向姜剑云教授献上我的“告白”。最初收到《文史探赜》初稿之时，委实有些眩晕症状。那是因为本书研究范围甚广，理论甚是严谨。更是因为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位学者所具有的真实、真挚、勤奋、卓越！

姜剑云教授将本书命名曰“文史探赜”，此题目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全书之性质。这正是姜剑云教授所持有的“文史会通”之问题意识，这也使得本书发掘了其他学者所未及的更深层次。本书副题又曰“古代文学纵横论”，这是对全书的进一步诠释。因为“纵”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学史之视角，“横”指诸如诗歌、小说等多样的文学体裁。

众所周知，姜剑云教授在谢灵运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果，我们通过本书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谢灵运在当时属于怀才不遇之士，他心中暗存不满，最终被以谋反之罪处刑。但是，他的文学反而因此大放异彩，丰富了文学史。他的诗摒弃“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风，全新地开辟山水诗，这可谓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姜剑云教授正是把握了此点，又就谢灵运的佛教认识、佛教与文学的关系、佛经政治、山水诗、情景理之融合诗等

话题，做了深入的剖析。

我们说文学思想就是关于文学的有意味的思想，本书对这句话有充分的反映。因为本书对文学思想史上一些十分重要的概念，进行了重新思考并对其进行了界说。比如：将陆机视为结合了抒情精神和艺术精神的自觉审美作家，认为傅玄与曹丕存在文体风格上的个性差异，指出陆云形成“文贵清省”之主张实有特殊的内因外缘等。又如姜剑云教授以批评史之视角审视研究太康文学，并将其作品倾向总结为“情多气少”、“袭故弥新”、“绮靡工巧”。这些都是可观的成果。

本书可以说是姜剑云教授研究成果之集大成。但是，本书各篇始终在文学史的视野中执笔完成，此点特别值得关注。本书自中国文学史上备受瞩目的孔融开始考察，继而探讨魏晋南北朝的重要文士、中唐时代的通俗诗派和雅正诗派、唐代怪奇诗派的偏善独至之艺术品格以及其衰变、金代完颜璘的佛禅意蕴、金代寺院碑文的文化意义、明代长篇小说《西游记》之主题探索，等等。这都向我们展示了纵横无尽的功力。

姜剑云教授的一系列宏论中也有给予我感动的部分，那就是研究了在文学史上不受偏爱的人物。如对傅玄的文体风格观念和左思辞赋的“尚用宜实”主张之关注。众所周知，傅玄和左思并非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显赫足迹的理论家。但是，姜剑云教授还是阐说了傅玄的“承其流而作之”和“引其源而广之”对于文学创作提供的重要理论，指出了左思的“尚用宜实”之文体观和创作意识对前代政教文学发展史进行的批判式整理。通过这些，我可以发现姜剑云教授之实践性“仁学”。

除上述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姜剑云教授对域外汉文学的扩展。本书中对高丽大儒李穡的研究便是一例。李穡是韩国历史上的学者、作家，其生活在韩国的丽末鲜初、中国的元末明初。他参加过五次科举，其中两次在元大都，并中进士。姜剑云教授评价李穡为“东方大儒”，又在“儒释相非久”的时代浪潮中探寻他与佛教之渊源，最后对李穡“唯善亲释”的评价很是中肯。

姜剑云教授是一位文学研究者。因此，他才会对有关文学根源的问题进行不断地追问。通过这些努力，姜剑云教授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发掘了诗性精神。也许这正是文学的本质。但这精神具有什么样的方向性呢？姜剑云教授也作出了客观回答，这就是“人学”。在为人类服务的文学上，文学作出服务之时文学才更像文学。我想这也许就是姜剑云教授作为学者的最终指向吧。

姜剑云教授和我虽处在中韩两个不同的空间中进行研究，但我们均以古典文学为中心来探究文学思想。我认为本书虽研究了中国不同时代的文学，但本书在促进东亚“共善”中会起到一定作用。姜剑云教授通过文学研究从而追求作为“人学”的“仁学”，这值得敬重和称赞。这样，我们才会认识到学问之路即是人间之路。

以上拙言，谨以为序。

韩国国立庆北大学 教授

岭南文化研究院 院长 郑羽洛 谨序

序 二

善哉！善哉！我与姜剑云教授在2004年结缘于香港。那年11月，香港佛教能仁书院为弘扬佛法，筹划文化活动，在中国辽金文学会协办下，举办“佛教与辽金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除云集两岸三地专家学者外，还有日本及新加坡学者出席，场面盛况空前。会议筹委负责人孙昌武教授在总结会议时致辞指出：“有些论文填补了历来研究的空白点；更多的论文提出了新颖见解或新鲜资料。这次会议确确实实把辽、金、元佛教和文化的研究推进了一步。同时通过这次会议，联系和团结了中、外学者，内地和港、澳、台学者。这对于进一步推动相关方面的研究必将产生长远影响。”孙氏对会议成果给予如此高度评价，实在令参会者鼓舞，其后大会出版论文集传世，以资纪念。

我首次拜读姜教授的文章，是他在会议中发表的《金代佛寺禅院碑记之文化内涵》一文，该篇文章内容翔实，史料新鲜，作者指出，通过对金代佛寺禅院碑记的考察，可得知金代佛教发展状况，有些碑记史料，更是“金代佛教发展的实录”，有助于填补金代佛教史的空白。此外，文中出现一些金元诗文大家名字，如朱弁、党怀英、王若虚、李俊文、元好问、雷渊等，这些熟悉的历史人物，与我的学术研究领域金元文学关系密切，故此读来倍感亲切。该篇文章结论又指出，金代佛教史的研究，除可关注“历代佛寺禅院碑记，还可以广及

塔铭”，甚至“酝酿、规划与实施《历代佛寺禅院碑记全编》、《历代佛寺禅院碑记研究》之类系统的专项课题”。姜教授的识见，令我深佩其人目光远大，怀抱非凡，脑海留下深刻印象。可惜会后，双方未有机缘继续交往。

时隔十余年，日前忽接姜教授电邮连同书稿请我为其新著《文史探赜》作序，在惊讶之际，心想难得远方友人青睐，对我信任，理应配合，不假思索便回复应允，并马上披览文稿，发觉每一篇稿子虽然陌生，但越读越兴趣盎然，增添不少前所未有的知识。拜读之余，深感姜教授知识渊博，学养功深，学术研究领域广阔，上起先秦诸子，中历魏晋诗文、佛学、玄学、美学，下迄明清小说，以及当世文学思潮，中西哲学、文学批评等，都功力深厚。下笔为文议论纵横，引用文献资料，无论古今中外，都能融会贯通，挥洒自如。论证资料，古今并用，中外兼融，而且层次鲜明，立论创新而合理，令人折服。姜教授是太康文学专家，同时对于魏晋佛教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也有卓越的成就。

本书佳作如林，例如首篇《孔融之死新探》一文，文章指出“孔融之死是一个很复杂的政治问题”，因孔融“维护礼教，忠诚于汉室，反对、阻止曹操代汉”，为保皇派代表，“是维护东汉政权的一面旗帜”，当曹操势力日渐膨胀，为铲除政治最大阻力，透过借刀杀人计，嫁祸御史大夫郗虑，由他著令下属路粹枉状奏孔融，诬孔融不孝罪名予以杀害。对于孔融之死，作者申论详细，史识令人一新耳目！又例如《金源后怪奇诗派引论》一文，文中述论认为，唐代的怪奇诗派，发展到金代，大放异彩。金人师古学唐，尚怪求奇蔚成风尚。作者首倡“后怪奇诗派”之说，甚有见地。其他篇章，学术观点为前人所未发，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学术水平高，内容丰富，卓见很多，吻合书名《文史探赜》之旨，读者可细阅品味！

方海霖

二零一七年香港季夏

序三 文学批评的冷与热（代序）

潘慧琼

与姜先生的学术缘分，起于十多年前擅自为他 2003 年出版的著作《太康文学研究》撰写书评，那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篇书评。现在想来，会在琳琅满目的书架上抽中那一本书，主要不是因为“太康”这一年号所辐射的文学世界恰好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而是在翻阅目录的瞬间，感觉此书作者的选题视角以及论述风格与我个人的批评直觉有着某种神奇的契合。如今，能以阅读论文集的方式集中分享他的学术成果，又能借作序之机悄悄散播一下自己的学术感悟，自然是万分欢喜。

论文集题曰“纵横论”，或许只是着意于“纵横”之自由无拘之意。我却要棒打鸳鸯，拆出其“纵”与“横”的两面来。姜先生上至魏晋下至明清的研究跨度，是“纵”向意义的追古溯源。继太康之后，姜先生对中唐雅正、通俗、怪奇三大诗歌流派的研究以及晋宋以来以谢灵运为重点个案的佛教与文学研究，是这纵向时间轴上极为突出的两个节点。姜先生关于中唐雅正、通俗、怪奇三大诗歌流派的集中研究，文风与我早年拜读的《太康文学研究》最为相似。在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面前，姜先生总是能够自然融合文艺学、政治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将文学现象放置在一个纠缠着时代政治风云和个体人格特征的立体场景中，间杂着对个人名

号、子女取名等细微的人性观照,从字里行间释放出人学立场的研究能量。本是严肃高冷的研究论文,读罢心中却能生出些许悲凉。由于职业文学家的缺失,中国古代社会无论提供了多少岗位来消化这些在书面文辞表达上优于他人的文学才士,纯粹以“文学精神”为纽带而坚持下来的作家、文学家或文学流派终究是不存在的。

在这纵向的时间轴中,以谢灵运为重点研究对象,以揭示佛教与文学关系的多篇成果对我而言是比较新鲜的。不是因为宗教与文学是一个新鲜话题,而是因为宗教对文学的影响是文学研究中最难说透的话题之一。一切伟大的宗教,无一不以洞察人情人性为前提。与普通民众的盲目功利不同,知识分子对宗教的吸纳是更为理性的,或者说一直都是有所取舍的,只有那些能够在本质上与其道德追求和审美取向真正达到异质同构的部分,才有可能真正被接受和吸收。这种吸收若是以注经论道的形式出现,无论义理多么深奥,也基本能够看到当事人的态度。可知识分子对宗教义理的消化一旦与其个体日常情感体验相交融,变成文学作品,其文字组合所传达出来的常常是一种混沌的情绪。尤其面对自然景物,无论喜悲,对以情绪敏感为特征的艺术创作者来说,都有极大的偶然性,这个时候要从诗句中强行解析出宗教的成分就很艰难。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对姜先生在继承古典文献学校勘、注疏、考证之严谨传统的同时,努力阐释诸多文学作品中的佛教审美意蕴深表敬意。

至于姜先生的“横”,主要来自论文集中最后几篇理论文章。十多年前我以“人学立场与审美发现”来统括姜先生《太康文学研究》一书的研究成就时,只觉得他的研究渗透着一股西化的文学批评精神,只是当时他在论述过程中对西方批评话语的注入并不是赤裸裸的征引。此番看到姜先生专门开篇辩论“诗性精神”、“文学精神”、“文学是人学”、“文学批评的性质”等极为抽象的命题,不但把早年研究《红楼梦》和《西游记》时期埋下的美学感受,彻底提炼成了高纯度的理论成果,而且“伶牙俐齿”,甚至有些“咄咄逼人”。如此之“横”,这在我所认识的古代文学研究学者中真是不多

见的。大部分古代文学研究者在吸收西方文艺批评成果时，通常只是借其核心词汇或结论，“知其然”即可，并无意于了解其“之所以然”。这些命题中的任何一个，在我看来都因为其本质的开放性而没有科学定义的可能。而姜先生如此引经据典地雄辩，不禁让我猜测他对文学批评究竟藏着一颗怎样火热的心。

姜先生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是平等的、非功利的、非教训的、高尚的、充满人情味的、人性化的‘读后感’”。这真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因为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独立实在太过于艰难。大文豪曹植一句“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说者无心，却不知对后世多少想要评品文学的普通读者造成了心理障碍。因为这“批评资格”的问题，批评家如果不借助更有影响力的社会身份或创作成就，其理论对文学创作的干预度将会极其微弱，文学批评最终只能强颜欢笑，定格在“立言以不朽”的姿态中。

此番受邀作序，恰逢本人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学。大学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中存放着大量的文学批评理论成果。在这里，艺术仅以艺术本身就足以获得尊重，无须再附加任何社会功用。因此，创作的热情与冷静的批评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正如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 M. A. R. Habib 在 *A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文学批评史——从柏拉图到现在》）一书中所倡导的，文学批评是为了获得理论，来识别和抵抗各种可能导向盲目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宗教信仰的伪装，而获得理论的可靠途径就是“close, careful, critical reading”，也就是对文本进行小心翼翼的批判性阅读。文学批评不是普通的读后感，而是经过仔细地、批判性的、全面地阅读之后，沉淀下来的理性智慧。姜先生的论文集，正是这样的文学批评。

2017年5月13日 伦敦

目 录

孔融之死新探	(1)
论魏晋之际傅玄的文体风格观念	(7)
论西晋左思辞赋“尚用宜实”之文学思想	(17)
论陆机“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的文学精神	(26)
论陆云“文贵清省”的创作主张	(37)
论太康文学情多气少的主题取向	(47)
论太康文学袭故弥新的体裁范型	(59)
晋宋“文义”与谢诗“玄学尾巴”成因	(70)
论谢灵运对涅槃佛性的认识与诗文创作	(95)
论谢灵运对般若性空的认识与诗文创作	(105)
谢灵运山水诗艺术特征辩说	(115)
论谢灵运诗情、景、理之圆融	(123)
谢灵运与《大般涅槃经》的改治	(134)
论中唐通俗诗派	(141)
论中唐雅正诗派	(151)
论唐代怪奇诗派偏善独至的艺术品格	(165)
唐代怪奇诗派之衰变探微	(175)
金源后怪奇诗派引论	(192)

论完颜璘创作中的佛禅意蕴	(203)
金代佛寺禅院碑记之文化内涵	(214)
元明之际高丽大儒李穡之亲佛略说	(229)
观照讽刺艺术, 索解西游主题	(242)
才子佳人小说与《红楼梦》的真、善、美比较	(252)
论诗性精神与文学精神	(261)
释“文学是人学”	(277)
后 记	(302)

孔融之死新探

孔融之死在《汉书》中有详细的记载。但关于其事之评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即使是《三国志》和《汉书》也有相互抵牾之处，甚至一书之中，论其原因也非一致。论者多矣，本文将从一系列具体的观点出发来分析孔融，从而探析孔融被杀的主要原因。孔融之死是一个很复杂的政治问题，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探讨。

一、孔融在政治上是成熟的政治家

袁淑在《吊古文》中说“文举疏诞以殃速”；颜子推《颜氏家训·文章》称孔融“诞傲致陨”。王鹏廷先生以为：“孔融反抗曹操，既无明确的目的，又乏机智权谋，仅恃才放旷，嬉笑怒骂而已。如他以书向曹操嘲讽为子纳甄氏与讨乌桓，均是取笑。”^① 这些观点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第一，孔融被杀是性格悲剧；第二，孔融被杀是政治幼稚的结果。

孔融被杀是源于其嬉笑怒骂的性格吗？建安九年，据《后汉书》记载：“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

^① 王鹏廷：《建安七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① 这则材料容易让人产生断章取义的错误，使人注意曹丕纳甄氏，而忽略“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这个前提。曹操攻占邺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城。袁氏家族的妇子多见侵略，可想全城将是怎样的一种残暴的场面。其暴行与蔡琰《悲愤诗》中所写“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何异。曹操以周公自诩，行屠城霸女之事。孔融批评的关键不在曹丕纳甄氏，深意在屠城。况且曹丕掠人之妻有伤风化，且使战争性质由朝廷统一天下之义举演变为争夺女人的荒诞。明于此，才可谓懂得孔融之苦心孤诣。这显然不是简单的取笑。

关于攻打乌桓的问题。曹操是在消灭袁氏兄弟，打败高干之后才打算北征乌桓的。此时，曹操的军队已经相当疲惫了。诸将皆反对征乌桓，理由有二：其一，“袁尚，亡虏耳，夷狄贪而无亲，岂能为尚用”；其二，如果“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②。所以田余庆先生认为，“乌桓对曹操的威胁绝对没有刘表严重，打乌桓可能得到的好处，也绝对不能同打刘表相比”^③。那么面对曹操的一意孤行，众人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孔融换一种戏谑的方式进行劝说未尝不可。曹操事后厚赏诸将，并说“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④。据此可见孔融的《与曹公书啗征乌桓》就不再是无厘头的调侃与讽刺了。

孔融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吗？关于这个问题，可以看建安前期孔融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张璠以《上书请准古王畿制》为例来说明孔融的“不识时务”。孔融提出的“颍川、南阳、陈留、上党三河近郡，不封爵诸侯”^⑤等建议是切中曹操扩张势力的问题关键的，是限制曹操，维护皇权的正当理由。《上书请准古王畿制》的出台是必然的，孔融不提，别人也会提。孔融任北海相的时候，杀掉劝自己结纳袁绍和曹操的左丞相，其理由是

①（宋）范曄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71页。

②（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页。

③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3页。

④（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页。

⑤ 吴云主编：《建安七子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故怒而杀之”^①。他的立场是站于东汉王朝的角度，而不是谋求自身的生存。当刘表有“桀逆放恣，所为不轨，至乃郊祭天地，拟仪社稷”的僭越之举时，孔融从朝廷的尊严和政局的稳定出发，提出“宜隐郊祀之事，以崇国防”的对策。这个政治方略不仅显示着孔融政治上很成熟，而且说明其从大局出发看问题的意识也很强。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孔融代表汉献帝安抚袁绍之举，可谓政治外交上的成功。他还在给马日磾加礼、恢复肉刑等问题上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且被朝廷认可。

二、孔融是汉末拥护朝廷的一面旗帜

曹操多次颁布《求贤令》。其收揽的人才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投奔汉献帝的，或者说对东汉王朝怀有感情的人。如杨彪、孔融、荀彧、赵温、赵谦、杨修、董承、吉平、耿纪等。一是投奔曹操来的。如夏侯家与曹家的诸位将军，其他还有钟繇、郭嘉、华歆、田畴、徐晃、许褚等人。此两者，我们可称为保皇派和保曹派。三国人才，唯魏最盛，当然汉献帝的号召作用不可忽视。孔融是保皇派中的代表，换句话说孔融是维护东汉政权的一面旗帜。他是东汉朝廷在舆论上的坚决捍卫者。这种捍卫可以清晰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孔融极力维护皇权的尊严。“君君臣臣”的思想与忠君的思想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融作为孔子的二十世孙，无疑是儒家思想的坚守者和践行者。孔融杀其左丞相足以表明孔融在忠君问题上的立场。曹操征孔融为少府是看中其在文化政治上的影响，孔融之所以来，看中的是曹操“奉天子”的举动。

关于太傅马日磾出使袁术无果而终一事，“朝廷议欲加礼”。孔融从

^①（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64页。

《汉律》出发来加以反对，朝廷从之。建安五年，汉献帝二子南阳王刘冯、东海王刘祗夭折。献帝欲为其子“修四时之祭”。孔融从礼法的角度，否定这种不合礼仪的祭祀方式。在关于马日磾加礼、献帝为子修祭、刘表僭越等问题的处理上，孔融都是从维护汉室王朝的尊严和形象出发，充分地发挥了旗帜作用。

其二，孔融保护和推荐保皇派人员。孔融作为东汉末年清流派的代表人物，其幼年便以保护党人而闻名。孔融十六岁时，张俭为躲避朝廷追杀，逃到孔融家避难。值孔融兄长不在，而孔融义救张俭。孔融为张俭等党人那种疾恶如仇，伸张正义、心系苍生的壮举所感动，同时也体现了孔融本人从小就有不惧权贵的超凡胆量。事后泄，孔融勇于担当。终以坐罪孔褒结束。可以说，孔融的誉满天下，依靠的不全是孔子的祖荫，而是自己在士林活动中用命换来的。孔融的勇于担当，心系士林，是不容我们怀疑的。建安元年曹操欲杀杨彪一案，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曹操奉天子都许昌，“见彪色不悦，恐于此图之”，“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①。此事，曹操无任何杨彪的罪证，而加罪于杨彪。孔融“不及朝服”，往见曹操，责备其“横杀无辜”，并表示自己也没法在这待下去了。“操不得已，遂理出彪”。杨彪是典型的忠汉分子。有事例可以证明：第一，中平六年，杨彪因冒死反对董卓迁都而被免职。第二，兴平元年，遭李傕、郭汜之乱，杨彪“尽节卫主，崎岖危难之间，几不免于害”。第三，黄初元年，曹丕继位，欲以彪为太尉，杨彪以世代为汉臣不便侍新朝为由辞去。孔融与杨彪在尊刘忠汉问题上的一致，是救杨彪原因所在。

孔融在其政治生活中，为朝廷推荐了大批人才。如赵台卿、祢衡、盛孝章、谢该、边让等。孔融所推荐的人才，多属文化界的精英。由此可见，孔融不仅是清流派的首领影响着社会的舆论，同时也是忠于汉室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成为拥护汉廷，抵制曹氏专权的一面旗帜。

^①（宋）范曄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88页。